

啟東設縣碑記

啟東縣志

啟東文史選輯

東海近百

海門相

之真摯

侯子華清

願國省

情乃為不

蘇省政

之張

縣志

十七年



启东文史选辑

第五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启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封面题字 陈启贤

封面设计 丁立松

责任编辑 曹仕恭

内部资料

启东解放印刷厂印

目 录

我为孙大总统授印·····	袁希洛(1)
周应时将军传略·····	沈维岳(5)
我参加辛亥革命前后·····	施方白(6)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沈维岳(11)
王志贤为孙中山先生治病经过·····	薛祖昌(14)
大革命时期的济难工作·····	姚志仁(21)
赵克明在敌人法庭上·····	档案资料(36)
一个奇怪的俘虏·····	李 挥(41)
一条狗命·····	朱茂华口述 杨丕荣整理(45)
张謇在通海办垦牧·····	李质彬(49)
垦牧乡土教材·····	黄寿康(52)
大生二厂·····	李质彬(55)
吕四的聚煎场和板晒场·····	陈石林(59)
大生乙种农校·····	曹子琴、施卓仪(60)
通海垦牧公司的文化教育·····	海复乡 编史组(63)
张筱田办吕盛布厂·····	徐瑞彬(66)
郁岂生办教育和慈善事业·····	陆继权(69)
郁岂生两次赴英·····	陆继权(75)
二效镇的寿丰桥·····	崔伯安(79)

忆周儒谦先生·····	周儒良 周协和(81)
怀念周儒谦先生·····	沈力行(87)
回忆父亲周儒谦·····	周瑞英 周村陶 周雪梅 周村和(90)
台属办企业，致富众邻里·····	张一国(94)
香港会亲记·····	施 杰(99)
评弹老艺人倪省三·····	黄罕澄(107)
解放前启东司法二、三事·····	陈国维(112)
解放前启东轮航事业的回顾·····	蔡玉麟 李固卿(120)
解放前启东汽车运输事业的回忆·····	张士明 黄锦清(125)
读者来信一组·····	周明祥 江苏省南通市建筑安 装第二公司第六工程处上海工区 沈石千 杨德心 倪国坛 毛永富 胡逸松 茅一辉(129)

我为孙大总统授印

袁希洛

袁希洛先生，江苏宝山县人。他是1928年启东设县后的第一任县长。

希洛先生1905年留学日本东京，1907年参加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他在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回国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一月一日，在南京举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典，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与会的十七省代表公推江苏代表袁希洛先生为大总统就职时的授印代表。

这篇回忆录是袁希洛先生1957年写的《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中的第五节，标题是编者加的。

袁希洛先生在建国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于1962年1月29日病故，终年八十岁。

上海既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商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那时南京尚未光复，武昌黎元洪都督来电约各省代表赴武昌集会，我与陈陶遗、雷奋、马君武同乘招商局江轮赴汉口。该轮恐驶经下关时要遭炮击，故临时停航，乃又在镇江改乘日轮西上。在镇江旅店中，又遇到奉天代表吴景濂、直隶代表谷钟秀，遂同轮赴汉口。船经下关时，望见狮子山炮台上尚升着黄龙旗，远处隐隐有炮声。到汉口上岸，见北兵

拖着发辫，徒手在日租界沿岸徘徊。我们即住在日商旅馆，当天晚上湖北代表胡瑛等开欢迎会，说：“今天你们各位到汉口，这是近年最平静的一天。前数天，黄兴给冯国璋打败，冯军进入汉口、汉阳，在龟山架炮轰击武昌，黎都督退到洪山。前天晚上，冯军放火烧了黄陂街。昨天冯军尚放炮向武昌遥击，武昌未还炮，始停止”。次日陈、马、胡、谷四人去武昌，我与雷奋未去，在寓所等待。到了次日午后一时，陈陶遗回来，并与都督府秘书魏某（名字记忆不起了）同来。陈向我们说：“袁世凯派军使到武昌，与黎都督商谈双方停战，但要南京与武汉同时停战，因此派魏秘书来，请你们偕魏秘书在今天下午四时乘去上海的日轮赶回镇江，向程都督接洽，请他立即攻下南京，托下关江中的英舰以无线电通知武昌，与袁方停战。”我们即乘原来的日轮，四时东下，次日下午抵九江时，已得江西军探上船报告南京已攻克了。

代表团在二十多天內，差不多天天开会，制定了临时约法。袁世凯派人来运动各省代表要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有的代表动摇了，但同盟会中出任代表的，多加反对。这时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回到上海，代表们决定选举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任副总统，乃于辛亥年十一月初九日开选举临时大总统大会，计到会的有十七省的代表，人数四十余人。这时马君武已改任广西省代表之一。我以当时代表团中未有秘书，故兼任笔墨工作，所有秩序单、当选票数记录，都是以粉笔写在黑板上，计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盖以省为单位，每省投一票故也。这时，我又用墨笔在长方形毛边纸上，写“当选人孙文十六票”。于是，大家拍手欢呼，各省代表并将我拥抱高举，一同走出会场。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当选。

孙当选总统后，提出改用阳历案，有少数代表说：“孔子说，用夏之时。自汉武帝时起，中国即用夏历到现在，已二千年，不可轻改”。我说：“孔子是殷的子孙，他反对周历，当时不能主张用殷历，所以来一个用夏之时。我们始祖轩辕氏，以甲子年、甲子月朔的一天冬至为岁首”而现在世界所用阳历，以冬至后第十天为一月一日，是与轩辕氏所定以冬至为岁首相近，不同夏历正月初一，要后冬至四十五天。于是多数代表决定改用阳历。

孙总统又提出废止跪拜礼，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全体决议通过。会议又决定以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迎孙中山先生来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二日，我去江苏省都督府将篆刻好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捧回代表团，各代表团推我在总统就职时为授印代表。国旗也由代表团拟定为红黄蓝白黑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表示五族共和的意思。总统府设在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王府。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由上海乘上午专车来南京，各代表于午膳后赴下关火车站欢迎，午后三时专车驶入车站，各代表登车欢迎，孙一一握手，专车即由下关入城，徐徐开车进抵总统府车站停车。各代表下车，拥中山先生入总统府大堂后花厅休息，此时已下午五点钟，室内已上灯了。各代表一面饮茶谈天，一面有人提议取纸笺自写某省代表某人，取总统印加盖纸上，留为纪念，大家赞成，纷纷取笺自写。我因陈陶遗送副总统黎元洪当选证件去武昌，代他写了一纸，留为纪念。八时，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大家拥了中山先生到大堂。此时新军九镇的士兵，从大门起左右站立，五色国旗飘拂直达大堂阶前。司议员是第九镇统制徐绍

楨，唱鳴禮炮，炮聲二十一响后，即开始了。我站在礼台左侧边，总统向南立，右边是代表景耀月，左边是总统秘书长胡汉明。总统举左手宣誓毕，景耀月代表致颂词，胡汉民代总统谈答词，总统亲谈就职宣言。我手持大总统印授总统，总统受印，交秘书长盖印于宣言上。这庄严的典礼以在夜间的原故，南京当时的摄影者未有镁光的设备，不能摄一照片，可惜得很。礼毕，总统开夜宴，招待各省代表及来宾，宴毕已十一时，各代表辞归，总统亲送出至大堂。各代表请总统留步，中山先生说：“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总统是人民的公仆，各位是主人的代表，礼当送至阶下。”乃在阶下握手而别。

周应时将军传略

沈维岳

周应时，号哲谋，字志奎，启东县久隆镇人。家里经营豆腐、面食业。生约光绪十年。于光绪三十二年入南京陆军学校，旋又被送入日本振武学堂，再转士官学校。宣统元年毕业回国，赴京朝考，录为武举，授副军校职，任南京陆军学校教习、候差。辛亥革命时响应起义，先任团长，旋升旅长。孙中山在南京就任大总统期间，周加入国民党。袁世凯窃国之后，周参加二次革命，率军北战徐州。一九一三年冬，周又去日本，接受孙中山指派，开办“浩然军事学社”于日本大森新井宿。周自任“筑城学”教育。一九一四年六月，孙中山决定成立中华革命党，周率军事学社学员一百五十多人一起参加，旋被孙中山指定为讨袁军江苏方面负责人，议为江苏督军，以图三次革命。是年冬天，周与陈其美、吴藻华以及启东同乡施方白先生等一起受孙中山指派回到上海，指导倒袁革命。周负责江苏方面军事斗争，曾派出伏龙等前往南通组织暴动，曾去苏州向驻军进行策反工作，秘密活动于沪宁一线。后因中风瘫痪，长期养病。北伐之后，定居南京，挂职军事参议，领中将衔。抗战前一年病死，葬于紫金山麓。

我参加辛亥革命前后

施方白

我于1910年在上海美术学校学习时，同学黄梁和我最为亲密，每于课余，常约我游张园、愚园、留园等处。在缙山草地等人迹稀少之地，他就咬牙切齿的大谈满清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类的惨案。谈了数星期之后，这位黄同学见到我非常同情了，他就语正词严地对我说：“你要知道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列强要瓜分中国，炎黄子孙有当亡国奴的危险呀！你想想看看可恨不可恨！”于是我说：“这当是可恨的事！”他于是亲密地和我握手，并且说：“你既然认为这是最可恨的事，那么我们合力想法推翻这满清政府”。我亦顺口说：“好，好”。第二天散课后，就和我谈同盟会的组织情形而劝我参加，我当时十分兴奋地答应了他。他后来再次试探我，考验我。过了十余天的晚上始约我办加入同盟会手续。主盟者是蔡元培先生。约在两星期后，黄同学又同我在另一个地方见蔡先生，同座者另有两人，随便谈话至三、四小时之久。其后与上海盟方常有联系。不过除了接到如《革命军》、《哀江南》等小册子外，从没有收到过具体的、有计划的关于革命教育的书籍。

1911年在县立师范教课，曾在报上发表了我一篇充满着改变现状的文章。由一位举人帮我修改的。自后一般人渐渐地认为我的社会地位增高了。更有年相若的亲友和同学们鼓

励帮助，居然不化一文以六十一票当选了县议员，在县议员中又选为参事员。当时要当选议员须年纪二十五而每年纳粮赋在两元以上。可怜的我，家中所耕者全部是租田，正税不归分文，而且年龄只有二十三，显见没有当选议员的资格。但是有人帮我用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办法来欺瞒了官厅，官厅亦故作痴聋不严格审查我的资历。是年秋，武汉革命事起——史称辛亥革命——上海响应。我于是联络同志在上组织学生军，众推我做司令，受沪军都督指挥。

1912年春，南北议和告成，家乡的议会改组，我的参事员位置仍留任。这时候的县政府当局和地方人士似乎相当重视我了。一再邀我回县任职，时正在严禁鸦片之始，当局者遂利用我“不顾名利，不为利诱”的脾气，聘我任禁烟委员，并经反对豪绅恶霸的人们的鼓励，我于是带了自卫队二三十名不分昼夜的捕捉烟鬼，特别注意于大户土劣人家。大约一个月之中，所获的烟具至少以千计，在富贵人家搜获的甚至是金镶玉嵌的东西。在一个绅富家中搜获毒物至三百余两，其余在一家搜获的毒物数十两或百两者，那是不足为奇的事。所搜获的毒品、毒具全数送交县政府，公布数量，当众销毁。

一九一三年倒袁军起，即是称二次革命，我参加陈其美组织之上海总司令部工作。党员名次三〇七号，概不发党证。开成立大会那天，孙先生演说至三小时之久。首先检讨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其重大错误为：组织不严密，使不革命或反革命份子混入，以致受重大牺牲，而一事无成。但这是极好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家不要灰心，只要百折不回，革命会有成功之一日……。革命是要有牺牲自己而替大多数谋利益的决心，如果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反对我

主张的人，请不要加入我们的组织，也不许加入我们的组织！……。孙先生这段话，深深地印入我的脑府，可以当作我初步走向革命路线的指针。

是年冬，奉命秘密回上海任党务兼财务工作。因为要做地下工作，除了和当时称为坚决革命的分子如周应时、吴藻华、张继芳、施述之、茅祖权、李海秋等往来外，也与一班地痞流氓市侩等周旋。蒋介石也于此时认识。

一九一五年，陈其美辈回到了上海。袁世凯此时已公开地要做皇帝了。陈其美、周应时邀我主办《五七报》，以反对帝制而鼓吹革命，我就不留余地地将袁皇帝骂得体无完肤。当时所谓“民党”的报纸已被封闭得干干净净。《五七报》的出版，群众非常欢迎。《五七报》是晚报。始印一千，不上一星期增加到五千份，到了下午五时以后，满街是叫喊《五七报》之声，真弄得袁世凯的走狗齐耀琳、杨小川辈束手无策。于此可见报章宣传确有功效。群众力量确是伟大。骂到第二十九天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奉袁皇帝之命封闭，主办人“施天权”坐牢罚款。“天权”是我的化名，我还记得出狱时，陈周雇汽车迎我，送我到浴室澡身，替我换全身新衣，并添菜举杯慰劳。当时已将牢狱之苦置之九霄之外，即席自告奋勇，而以“施及人”之名继续办报，继续骂袁，不过比较敛迹一些，报名《天中》。办到正满一个月那天，有一素有往来的巡捕房探伙跑得满头大汗来密告：“捕房又要来捉你了，快快躲开啊！”这位探伙说完，一溜而去。我则一面指挥同事，将重要的东西席卷而去，一面写：“本报业已停办”字样的纸条粘贴门外，掩门而去。刚走到对面的街口，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来了，真好险啊！如果没有这位探伙来送信，那我不知要坐多少时间的牢，罚多

少数目的款，或者竟有生命之险。

时有鼠胆灰色的朱熙任第二师师长驻守苏州。时常与上海的党人联系，表示愿起义反袁，并已约定发动时日。届时由周应时、吴藻华等率同志数十人，伪装各色人物分别混到苏州，预备在朱熙反正时，分任各项职务，所有印信、委令、布告统由我负责运苏。谁知朱熙因索二十万元的现款不遂而反悔，并下令驱逐。其实过去朱熙和上海党人信使往返的目的，不过想骗钱而已。

不久袁世凯刺死陈其美，居正领导之东北革命军在胶济路上得了根据地，我也前去作门下客。居正本不懂军事而才干亦甚平凡者，于是弄到四分五裂，不成样子。我偶或进言，也无多大效果。孙中山先生初派许崇智赴鲁整理，但已病入膏肓，无从下手。继派蒋介石任参谋长，也弄得一筹莫展而去。我觉得当时的党人，类多意气从事，本谈不上重视组织观点。

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自毙，黎元洪复傀儡登场，东北革命军被遣散。我打算以民主党人的身分共任国事。谁知，他们把门关得很紧，对于异党异派几乎一脚踢出，在段祺瑞为尤甚。这给浑浑噩噩，痴心梦想的党人们一个重大教训，我也受到了教训。幸觉悟尚早，在冬初即南返。南返后，杨注千老师，见到我连年出生入死，一事无成而发已斑白，劝我到伊家教书，以资休养。

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北伐战争，印刷事业交人接办，《江口报》停刊。我素不愿落后，在数个月前听到广东来的友人说邓演达先生是革命阵营中的前进分子，并且给我一篇邓先生的演说词，我非常羡慕。及邓先生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我遂邀季方同志介绍入总政治部工作，以冀亲聆其教。

初任遣赣部秘书，南昌克复后调任二十二师政治部秘书，主任为季方同志。当时季方同志的左倾色彩非常浓厚，反动分子在歧视提防，且北伐部队中已全面形成“左倾”“右转”的鸿沟，常听到有秘密捕人杀人的消息，季同志当然也相当的危險。于是借端离部，秘密赴汉，主任职务由我代理。那时已经从江西过浙江到了上海。从此，反动分子的目光就转移到我的头上来了。

一九二七年，大约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二日下午，忽接到东路总指挥白崇禧的密令：“着将该部所有共产党分子全数解押来部”等语，我考虑结果，就不顾一切，将共产党员胡若愚等六七人分别给资放走。过五、六日，以我为“跨党分子”而由做特匪到今日的刘伯龙很客气的用汽车迎接我到上海警察厅坐牢。此时上海方面正在创造杀人的新纪录，我当然也到了死亡线上。后来因有共患难者施述之、茅祖权等四出营救，并深入虎穴，而得到掌握杀人权的杨虎同意，方得保出，但精神已大受损失。

摘自施方白1951年写的《施方白自传》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沈维岳

孙中山先生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崇拜的伟人，他革命四十年，屡经失败，终于唤醒民众，推翻了封建王朝满清政府的统治，创建了中华民国，使中华民族有了复兴的希望。1925年三月，忽然传来他病逝的噩耗，我在家乡不禁失声痛哭。过了几天，报纸上登载了《总理遗嘱》，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语，对我触动很深。当时我是爱国的热血青年，也想投身革命，努力奋斗一番。第二年，在季方同志影响下，长途跋涉，到孙中山创建的革命中心广州，进了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学习。也是投笔从戎，寻找革命的真理，立志要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

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每逢星期一上午做纪念周，会上我们庄严地朗诵《总理遗嘱》，又想到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仍须继续努力。我们激扬地高唱校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锄军阀，锄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当时，帝国主义妄想瓜分中国，国内军阀鱼肉人民，真是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校长蒋介石常来训话。总教官恽代英，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我们做报告。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也常来军校讲革命道理。他们对我们的教育很深，使我们知道要把多灾多难、民穷国贫的中国治好，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民族平等——不受列强欺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独立自主，民生富裕。要取消封建剥削制度，做到耕者有其田，达到最后实现世界大同。这都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欲实现这个理想，我们要作艰苦的奋斗。

根据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举行北伐。当时我被分配在第一军。出发之前，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1926年九月九日下午蒋介石宣誓就职，向我们发布了讨伐军阀的进军命令。当时真是万众一心，群情激奋，誓师大会气壮山河。北伐军中有不少共产党人作政治工作，他们身先士卒，勇敢善战。叶挺部队更是所向披靡，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料一年以后，北伐事业到半途而夭折了。当时，我十分徬徨而苦恼，摸不清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何在？在季方和施方白先生影响下，我参加了邓演达先生领导的第三党，再探索革命之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片国土沦丧。我发现延安提出的一条救国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希望。1938年五月，我陪同施方白先生到延安观光。在武汉受到我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和教诲。到延安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教育，我遵循他的指示回我家乡启东，先后三次组织部队，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

由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先后参加过国共两党两次合作。我原来也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漫长的岁月中，终于找到了革命的真